

新闻业务

XINWEN YEWU

活叶版

7

总1556期

1978年3月3日

新华通讯社编

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

新华社
1978.3.18.

努力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

编者按：总社最近一个时期播发的一些宣传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报道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许多读者来信指出，这样的报道，真正起了激励人民、鼓舞斗志和指导工作、推动革命的作用。下面摘要发表其中的两封，让同志们看看读者多么热切地希望我们在这方面继续努力。

政策是路线的组成部分，是路线的体现。路线如果不体现在政策上，那不是空的了？不抓政策问题，不仅不能作到拨乱反正，也不可能真正分清路线是非。光是一般地讲路线是非，一碰到具体政策问题又分不清楚了，那怎么行呢？怎么能贯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呢？揭批“四人帮”的斗争怎么能真正深入呢？

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，对政策的破坏非常大，非常严重。他们把社会主义现阶段应当坚持的各项政策，几乎统统否定了。谁要执行这些政策，他们就说你“回潮”、“右倾”。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“四人帮”以来，用很大的力量抓了许多重大政策问题，各级党委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有的省委已提出要全面地清理政策，什么叫清理呢？就是把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恢复起来；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，要从政策上加以解决。我们必须赶快进一步加强对党的各项政策的宣传报道。现在实际工作中，有些同志在解决政策问题上还存在“等”的现象。你看我、我看你。上头不讲，他不干；上头讲了，他还要拿到红头子文件才放心。这叫做“心有余悸”，表明“四人帮”强加在人们头脑中的精神枷锁还没有砸碎。我们作为党的工具，应当通过我们的宣传报道去帮助人们迅速解放思想，彻底砸碎这些精神枷锁。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。

生动具体地宣传好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

——《“摸鸡笼子”是社会主义吗》等报道读后感

浙江人民广播电台 英捷因

打倒“四人帮”，新闻事业得解放。一年多来，特别是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以来，新华社的报道出现了崭新的面貌。新华社发稿的路子广了，题材丰富，又是群众关心的，说出了群众的心里话。稿子形式多样，写得实在，生动活泼，文风有了很大的改进，大家喜欢看了。一些好的稿子看了后，几个人还凑在一起议论，说写得好，有看头。这样，使报道工作真正起到激励人民、鼓舞斗志和指导工作、推动革命的作用。

举几个例子：刊登在人民日报一月十八日三版的通讯：“摸鸡笼子”是社会主义吗？；一月十五日二版的消息：吉林省去年土特产丰收；新华社记者从产姜区河南来信：群众为什么买不到生姜？还有难得出现的新华社编者按。多种形式，很吸引人。

及时地正确地宣传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以适应全国大干快上的新形势，是新闻报道的一项重要任务。政策是党的生命，它体现了党的路线，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，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强大动力。

几年来，由于“四人帮”的破坏，党的政策，特别是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，包括发展多种经营、社员从事正当的家庭付业的政策等等，不能贯彻落实，存在很多问题没有解决，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，影响了社员和集体的经济收入，也影响了市场供应。因此，准确、生动、具体地报道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，是广大读者所希望的。

这几篇报道文风好，一扫八股八股的流毒。它材料扎实，说话实在；采访深入，说群众的口语。同“四人帮”那种说假话、说空话、说大话、说套话，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记者选取了典型单位（盛产人参、貂皮、鹿茸等宝贝的吉林省，我国著名的商品姜生产基地河南省博爱县上庄公社，还有“摸鸡笼子”的湖北省钟祥县旧口公社建新大队），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，提出问题，分析问题，用确凿的事实和具体的数字对比，回答了问题。报道的这几个单位，在“四人帮”干扰破坏下，“砍断山上摇钱树，砸烂山下聚宝盆”，

“剥鸡头，革鸭命，房前屋后砍干净（砍树木）”，土特产和养鸡鸭等家庭付业受到严重破坏。而在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一九七七年，“政策上山 百宝下山”，面貌大变。难怪建新大队的社员说，“打倒了‘四人帮’，华主席领导我们抓纲治国，毛主席的政策又回来了。”这发自内心的话，讲得多好，多么实在啊！

新华社这几篇报道，语言生动，文字朴实、流畅、上口。建新大队胡元珍老大娘批判“四人帮”破坏家庭付业的罪行时说：“我们老太太养几只鸡，把鸡旦卖给国家，家庭增加了收入，也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，有什么不好？我们社员增加这笔收入，可顶大用场了，称盐打油，看病挂号全靠它，不愁零用钱”。这些很普通的话，切合身份，比有些报道中写的“社员们忿怒地说”之类，更形象，更有力。

文字流畅，有特色。记者描述建新大队“摸鸡笼子”时写道：“短短几天时间，全大队社员养的三千九百多只鸡，就处理了两千多只，真是搞得‘鸡犬不宁’。”在写到建新大队去年向国家交售鲜蛋一万八千多斤时，用了：“群众高兴，集体高兴，收购站摆满了白花花的鸡旦，国家也高兴”一段话，文字朴实无华，结尾干脆利落。

这几篇政策性的报道，有消息、有通讯，有记者来信。有些议论、道理不可能讲得过多，于是采用了“新华社编者按”，进一步说明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必要性。几种形式齐上阵，相互配合，宣传效果就更好了，宣传威力就更大了。

现在，全国许多地方开展“一批两打”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宣传发展正当的家庭付业，就很有必要。还有许多政策性问题有待宣传，比如农村“六十条”，“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”。而有些条件不成熟的地方轻率改变，必将挫伤社员的积极性、破坏农业生产。另外，在报道打击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时，要分清路线是非界线，否则又会把正当的家庭付业当作“资本主义尾巴”来割，报道上自相矛盾。

在改进新闻报道方面，新华社做出了好样子，值得我们很好学习。

新华社北京二十日电

要多搞有说服力的报道

编辑同志：

《群众为什么买不到生姜？》是发扬无产阶级文风的好报道，看了深受教育。

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工作、生活在工人群众之中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来，经常听到群众对买不到一些东西发出各种怨言。有些群众有时讲一些话很不受听。我有时也对他们作一些解释，但总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。所以说说服力不强，效果也不大。

见了买不到生姜的报道，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。我想“买姜”这件小事，华主席、党中央都关心到了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了我们党对群众生活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，只有我们共产党，才把群众的痛痒，视作自己身上的痛痒。反动派那会管群众的死活！老反革命不用提，就拿“四人帮”来说，他们终日花天酒地，从未听到过一句他们关心群众生活的话。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日子里，人们对他们早有咒骂。当人们拿起

报纸来的时候，对他们那些不符合事实的报道，总是给予嘲笑。而今天不是了，人们看到实事求是的报道后，总是说：这才是共产党人对客观现实的态度。矛盾不能掩盖，也不能回避，只有去揭露，去解决。把事实真相告诉群众，群众是通情达理的，是会用正确态度对待困难的。“四人帮”过去那种资产阶级虚张声势，颠倒黑白，玩弄笔墨的坏文风，把报纸办到了人们不听、不信、不愿看的程度了。

看了《生姜》的报道，激起我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限热爱的感情。华主席不愧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。我万分相信，在华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，被“四人帮”践踏、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一定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扬。

文风问题，也是立场问题、世界观问题。《生姜》的报道，就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风。它以深入的调查，具体的事实，深刻的揭发，短短的文字，展现在我们面前。它非常具体、深刻地讲给大家：为什么买不到生姜？这种文风应大力发扬。

首都汽车公司三场 李洪春

进一步解放思想 搞好报道工作

——上海分社情况汇报

总社召开电话会议以后，分社第二天就进行讨论。一月上旬又组织大家学习华主席的指示和元旦社论，敞开思想，联系实际，深入讨论了解放思想的问题。

大家认为，粉碎“四人邦”以后，在华主席、党中央领导下，我们的思想有了不小的解放。但是对照电话会议上领导同志的讲话，感到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，有不少差距，头脑里还有不少精神枷锁。电话会议号召记者解放思想，砸烂精神枷锁，这就抓住了搞好当前报道工作的要害问题。讨论中，大家认为当前思想上的精神枷锁，主要是以下几种：

1、怕人家讲是“否定文化大革命”，是对文化大革命“抽象肯定，具体否定”。因此行动上缩手缩脚。比如讨论怎样报道物质奖励时，工业组不少记者不敢接受任务，怕被说成“否定文化大革命”，心想还是避开一点“保险”。

2、盲目地怕人家说是“反对毛主席思想”。不能辩证唯物主义地、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待毛主席指示，不能准确地、全面地领会毛主席的思想体系，弄不清“四人邦”伪造、歪曲、篡改了毛主席的哪些话。

3、怕解放思想“出了边”，讲“过头”话。这点当然要警惕，但事实上，当前主要是思想解放不够，跟不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，还谈不到什么过头的问题。

4、怕产生副作用，不敢把“四人邦”的严重罪行充分地写到报道中去。这也是应当注意的，但也不能因噎废食。

5、从业务思想上来说，有些记者怕被说成“走老路”，因此不敢写游记、知识性等一类报道，风光照片也不敢拍。采访活动中更不敢广交朋友，怕以后有事说不清。总社要求摄影组拍摄演员家庭生活的照片，提供给香港大公报用。记者打电话到一个越剧演员家里，但那位演员坚持要在办公室拍，怕以后说不清。这位记者也怕说不清，没有敢去。

6、怕追究记者的责任，怕挨整。一部分记者中存在“多写多错，少写少错”的思想。

以上六点，只是一部分精神枷锁，不打碎它们，要大千就甩不开膀子，想大上也迈不开步子。关键是对“四人邦”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没有揭深批透，路线是非还没有分清楚。

学习讨论过程中，分社各组联系实际，深入揭批了“四人邦”的修正主义路线，主要领导人带头发言，解放思想，对过去被“四人邦”搞乱了的路线是非进行了议论，拨乱反正。

精神枷锁少了，思想就逐步解放了。最近讨论一季度报道时，记者思想比较活跃，敢于议论一些过去不敢议论的问题，订出了一批结合实际斗争的题目。政文组过去报道题目出不来，现在思想活跃，一下子出了四十多个题目。一个教育记者原来想在报道中揭批“四人邦”的所谓批判“五分加绵羊”，但又感到吃不准，所以迟迟没有提出来。最近，他的思想进一步解放，在领导和大家的支持下，已着手采访。经济组也热烈地议论了一些问题。如恢复革命传统是不是走所谓“老路”？抓生产的干部算不算好干部？工厂里要不要“法规”？并且针对这些问题订出了一批题目。深受“四人邦”迫害，被下放“战高温”的几位记者，怀着对“四人邦”的无比仇恨，提出了彻底批判“四人邦”迫害干部的报道题目。